

宋慶齡的一生（下）

洪文山

五、結婚後夫唱婦隨

「國父與盧夫人的結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國舊式的婚姻。他二十歲在香港讀書時，便和盧夫人結婚。結婚後只有寒暑假回家的期間，才有機會和盧夫人團聚。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他逃亡至檀香山，楊太夫人和盧夫人由友人護送至檀，他與盧夫人有數月的聚會。此後，他奔走革命，與盧夫人相聚之時更少。民國元年二月二十日，鄧澤如護送盧夫人至南京，三月二十日，盧夫人離南京返粵。他卸任總統職務後，在北上時，約盧夫人偕行。但他與盧夫人的興趣、知識和習慣，都有很大的距離，共同生活雙方均缺乏樂趣。」

「民國二年八月，二次革命失敗，他至日本，重新籌備組黨，慶齡女士適由美國學成歸國，路過日本。慶齡女士自幼對他崇拜，因孔祥熙的介紹，擔任他的英文秘書，相處將近一年。據『宋氏三姊妹』一書敘述，他與慶齡女士的婚姻，不是他主動的，是先由慶齡女士表示愛意。他多年寂寞的個人生活，忽有一溫柔體貼的女性，對他

崇拜，表示愛意，這是任何人很難拒絕的。但他不願隨便接受，堅持須得慶齡女士父母的同意；同時還要先得盧夫人分居的同意，然後才進行與慶齡女士的婚姻。

「有人說：他為什麼不與盧夫人離婚僅協定分居呢？這種議論，是不明瞭當時中國社會的風俗。自滿清時代以至民國初年，男子在社會上有優越的地位，雖有三妻四妾，社會不以為怪。我國民法頒布，規定男女平等，是在民國十八年，我們不能以民法頒布後的法律觀念，來批判當時重男輕女的社會。外國反對他的人，誹謗他是一夫多妻，也是就外國法律觀點來批評，不明瞭中國的社會情形。當時丈夫主動與妻子分離，叫做休妻，妻子叫做棄婦，無所謂離婚之說。凡是休妻和棄婦，在社會上是喪失地位的。他為顧全盧夫人的地位，形式上是分居，實際上是不再往來，等於現在的離婚。但必須得盧夫人的諒解和同意。盧夫人述中山先生歷史函，曾有『後召氏往日本，商配宋氏之婚。』他得盧夫人同意分居之後，才確定與慶齡女士的婚事。在重男輕女的當時，他的行為光明正大，合理負責，如何可隨便

加以非議呢？雷脫里克在所著孫逸仙傳記中，對他的再婚，以基督教徒的觀點，表示不贊成，但同時說：『他的再婚，同基督教美國千千萬萬男女的行為，在本質上並沒有差異。』

「慶齡女士返上海省親，大概是在三年七八月間；她返上海的原因，是在省親，同時徵求雙親對他們婚姻的同意。她的母親堅決反對，她的父親叫她等待。她等待了三個多月，她的母親還是堅決反對。慶齡女士不顧一切，毅然不辭而別，潛赴日本，以完成她婚姻的志願。慶齡女士到達日本以後，他和盧夫人的關係，業已解決，在道義上已無責任；而慶齡女士不惜與家庭破裂，對他一往情深，他於情於義，均應接受，遂在民國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東京舉行婚禮。」

「他在與慶齡女士結婚前，同志中有反對者，他說：『我不是神，我是人。』又說：『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會惡習慣所支配。』慶齡女士對他的愛情，已達到白熱程度，她明知他已經結婚，而且有一個與她年齡相若的兒子，仍是毫無條件的愛他，更沒有提與盧夫人分居的要求。但他理智勝過情感，不願她居於妾的地位，必待盧

夫人同意分居之後，才願意進行婚事。他雖然是人，已是非常的人了。他要再婚，雖然是她先發動，但他從來沒有說過；若果『宋氏三姊妹』一書，未敘述慶齡女士婚姻經過，作者雖是他四十二年的信徒，也無從知道他的再婚的情形。當時在東京的覃振先生，曾對作者說：『當孫先生與慶齡女士未結婚前，胡漢民、朱執信曾當面諍諫，孫先生僅答覆說：『展堂、執信！我是同你們商量國家大事的，不是請你們來商量我家庭的私事。』對漢民、執信等最親信的同志，都表示是他的決定，沒有透露一點被動的消息，可見他對慶齡女士的摯愛與尊重，也可見他勇於負責的精神了。』

根據筆者翻閱日本外務省檔案所得資料，

國父於民國二年八月十八日抵東京住赤坂區靈南坂町二七番地，這時宋嘉樹先生也帶兩個女公子三位男公子住東京神田區北神保町一〇番地基督教青年會（文獻四五一二六三、四五一四四六及四六〇〇九號），因北洋政府密探企圖暗殺革命黨員，宋家又遷至神田區仲猿樂町九番地自宅（四六一一五七號），宋嘉樹的大姊宋嘉齡繼她父親宋嘉樹之後担任孫先生的秘書，直至民國三年與孔祥熙結婚，九月開始由宋慶齡（化名宋慶林）担任秘書，民國四年九月三日 國父元配盧夫人偕僱人抵達東京（四八〇六五一號），九月廿日 國父陪同盧夫人乘電車至上野動物園及博物館參觀（四八〇六七八號），九月二十二日至九段遊戲館參觀（四八〇六九一號），又至銀座，三越購物，九月廿五日以汽車送盧夫人至東京車站，

再由朱超送至橫濱乘船赴夏哇夷（四八〇六八八號）。十月宋慶齡由上海回東京，十月廿五日結婚，十一月十日宴請賓客。宋慶齡在一九七八年對日本作家仁木文子的問答自述說『我父親雖然反對，但我乘家人睡覺時逃出來，乘船至日本，父親立刻趕來，但已是結婚後，也沒辦法。』一九一五年十月廿五日在東京結婚時參加婚禮的有頭山滿、和田瑞、秋山定輔、山田純三郎、萱野長治、菊池等……』

與國父同患難共生死的東方虬髯客宮崎滔天也參加婚禮，宮崎滔天全集第五卷有「與國乎？傾國乎」乙文稱，「不知是否命運之神的安排，等待風雲雄飛的亡命客孫文寓有一來客中國佳人，所謂才色兼備，加之富裕，博辯宏亂，元氣潑刺 孫文歡迎連日快談不知時遷，民報青年社的同志大呼不平『新來的人旁若無人』，滔天大為着急，但眼看意氣投合，民報青年不滿爆發，對孫文提出強硬要求，孫文曰既成事實，滔天苦言無效，此佳人名叫宋慶齡」。可能是因此，宋慶齡未提及宮崎滔天。但松岡洋子譯史諸著「覺醒之旅」中有一段「她看不出有呆板巨大的表情，她謙虛、不隨便說話，她以歷史所付的任務，不向違反自己意志的壓力妥協，需要很大的心胸與肉體的勇氣，對人誠實澹泊，但對偽善者像刀一樣銳利，不知其頭腦敏銳又有軟柔的一面的人，常誤她的能力為樸素。」

宋慶齡和 國父結婚後，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回國，正式的回國是六月，但在此以前國父已秘密回國指揮討袁， 國父的信上有一余

自東京回國已經三個月」（通告黨員儲金規則一九一六年九月十日），一九一六年五月廿七日宋慶齡致媒人梅屋庄吉的太太梅屋德子的信中說「在上海陳家附近借屋居住，但袁探巡邏很危險，信上不要寫孫文的名字」，並退還下女旅費，署名是中山瓊英。（國方家藏）

一九一七年廣東成立護法軍政府， 國父就任大元帥，以後往來上海、廣州間，並命令北伐，五月四日 國父辭大元帥職，五月廿一日軍政府改組國父離粵，二十六日蒞三河壩會晤先總統蔣公，六月一日再由汕頭至廈門，並經台灣轉日本於二十六日抵上海。一九一八年五月三日宋慶齡的父親宋嘉樹先生在滬病故，卒年五十五，宋子文當時住上海法租界霞飛路四九一號，孫夫人亦同娘家參加父喪禮，七月二十六日 國父得熱病，可能是肝癌最早之現象，帶病偕孫科夫人及二孫見岳母倪太夫人（見研究中山先生史料與史學第一七九——一八二頁），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 國父偕夫人正式遷上海法國租界莫利愛路二十九號加拿大華僑所贈房屋，宋慶齡自述「加拿大一華僑看孫先生借房遷來遷去，購買後贈送孫先生，一九二〇年正式遷入，但以後也因革命資金作抵押，加拿大華僑又買回來，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宋慶齡一直住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廿九日國父偕伍廷芳、唐紹儀抵廣州，十年元月一日國父在軍政府演講有組織正式政府之必要，十年四月二日國會非常會議，四月七日選出國父為中華民國

大總統，五月五日在廣州就職，十二月 先總統蔣公扶夫人樞安葬後抵廣州，國父信任有加，一九二二（民國十一年）年國父在桂林準備北伐之際，陳炯明叛變，與吳佩孚勾結，暗殺粵軍參謀長鄧鑑，不得已班師回粵，六月十六日陳欲攻總統府謀害國父，國父偕夫人深夜離粵，乘軍艦脫險離開廣東回到上海，這時李大劍、越飛、陳獨秀等人開始出入中山故居，容共政策也在此時產生，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發表的中國國民黨宣言及內部的改組委員已有林祖涵、陳獨秀的名字（國父孫中山先生傳四八四頁），一月十六日陳炯明逃走，廣州光復，二月二十一日國父抵廣州成立大本營，八月五日派先總統蔣公訪俄考察軍事後，一九二四（民國十三年）作了兩項劃時代的決定，一是一月廿四日任命蔣中正先生為黃埔軍校校長，開學時 國父夫婦均親臨校閱，另一是一月二十日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期間宋慶齡始終追隨 國父左右，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前國父指定了宋慶齡、何香凝、鄧穎超三人為婦女代表， 國父在一九二二年向廣東女子師範演講時已強調「婦女要了解三民主義」，如果教育程度提高，男女平等才能達成。結婚十年國父在世期間，宋慶齡確是追隨國父左右，共患難同生死。

六、國父逝世喪失導師

一九二四年 國父為了召開國民會議偕夫人由廣州回上海，經由日本赴北平，十一月十日出發前的北上宣言表明不對北洋軍閥妥協，對外要

廢除不平等條約，對內要掃除軍閥完成國民革命。十一月十九日在上海中山故居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北上宣言，二十一日由上海出發，二十四日抵神戶，在日逗留一星期，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戶高等女校發表「大亞細亞主義」的演講，強調「被壓迫的民族在亞洲、歐洲，都受霸權的壓迫，大亞細亞主義才是王道，日本一方面吸收歐美文化，但本質還是東洋王道文化，希望日本作為遠東的堡壘，不要做西洋的霸犬」（日本外務省調查部孫文全集上）。國父在日本奔波三十年最後留給日本人的遺囑，在二次戰後日本人才體會到他的偉大。

國父偕夫人，十一月卅日由神戶出發乘北嶺丸赴天津，十二月四日抵天津，十二月三十一日抵北京，全國民眾都寄以熱烈的期待，不料肝癌發作，一月二十六日入協和醫院接受開刀，國父接受開刀是宋慶齡勸導割治的，國父本身是醫生，當然知道自己的病情。開刀結果全肝已硬化，由德、美、俄三國醫生取細片檢查確為肝癌又縫好，改用鐳錠治療，二月十二日孫夫人勸改服中藥，十八日遷回行轅服中藥仍無進步，二十四日國父病篤，孫科、宋子文、孔祥熙、汪兆銘進入病房，請示遺囑，其中對家屬部份為：「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

國父孫中山先生遺囑簽字及逝世時的情景，傳啟學者「國父孫中山先生傳」記載甚詳，謹摘

記如下：

「國父服中藥後，神志甚清，但病狀並未消滅。三月一日，請留日醫生王綸用日本最新發明的治肺癰藥水，每隔一日注射一次。這時孫先生神志清楚，體溫如常，每一睡醒，即詢問東江討逆戰事情形。各同志報告黃埔學生加入右翼作戰，由蔣中正校長統率指揮，連戰皆捷，已與粵軍進向潮汕，孫先生諷：『應電令嘉獎』。三月十日停止注射藥水。十一日病危。正午，忽張目遍視床前家屬，並向齊侍床前的各同志說：『現在要分別你們了，拿前幾日所預備的那兩張字來呀，今日到了簽字的時候了？』汪兆銘遵諭將遺囑稿並墨水筆呈上，孫先生右手執墨水筆逐一簽名。腕力雖弱，所簽文字仍甚清楚。此時在病榻旁侍疾者，除孫夫人宋慶齡及孫科外，有張人傑、吳敬恆、汪兆銘、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賽、邵元冲、戴傳賢、鄒魯、陳友仁、何香凝等十餘人，孫先生簽名之政治遺囑與家屬遺囑，經各同志依次簽字證明，汪兆銘則簽署為筆記者。」

「國父於稍靜息後，以極安靜的態度向各同志說：『我此次放棄兩廣，直上北京，為謀和平統一。所主張統一方法，是開國民會議，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建設新國家。茲為病累，不克痊愈，生死本不足念；惟數十年致力國民革命，所抱定之主義未能完全實現，不無遺憾。甚望諸同志努力奮鬥，使國民會議早日開成，達到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之目的。如是我在九泉之下，亦堪瞑目。』。說話完畢，呼吸益形艱難，精神疲倦，不能再連續說四五字以上之語，微聞不

連不斷之聲，反覆說出『和平』、『奮鬥』、『救中國』數語。醫生以病人太辛苦，請靜默安眠，遂靜臥。到了晚上六時半，再甦醒一次，手足已變冷，不能再言語。醫生對待疾同志說，脈已散，行將去世，須時加注意。這時孫先生又作欲語狀，宋慶齡聽知是呼喚汪兆銘，立呼汪兆銘近前，汪按孫先生之手，脈如遊絲，已不能再言語。

「次晨三時許，孫先生再甦醒一次，不能言語。八時許克利醫生仍臨牀一視，延至九時三十分，創造中華民國的一代偉人，遂與世長辭，時為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歲。」

武田清子在「亞洲革新中的基督教」——孫文與宮崎滔天」乙文中說一九三一年集錄的「孫中山先生榮哀錄」另有孫先生口頭遺囑：「依孫先生希望，妻宋慶齡在協和醫院靜靜地依基督教儼然地舉行私的葬儀。」

「孫文告訴徐謙，我是基督教徒，耶穌也是革命家，我妻也是基督教徒，因此我死後希望不要有差別。告別式的司儀劉廷芳在『孫博士的基督教特質』乙文說孫文的一生以信仰希望愛為宗旨，徐謙、孔祥熙都有同樣談話。」

三月十八日 國父的葬儀有四百人參祭，一萬大學生集合，家屬拒絕了臨時政府的國葬，三月二十四日舉行國民葬，學生、軍人、勞動者五十萬人，送國父靈柩至北京郊外西山碧雲寺，四年後由先總統蔣公率領的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一九二九（民國十八）年隆重舉行國葬典禮，將創造中華民國的一代偉人葬於南京紫金山，至一九八一年的現在，「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中山

先生於此」的石碑依舊在南京中山陵，儘管風雨、文革、大躍進都無法改變他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七、迷失方向偏袒共黨

國父逝世之後宋慶齡回到了上海中山故居，自五四運動以後上海已成為共黨潛伏的中心，上海先後發生內外紡織工廠顧正紅事件，英國警官開砲射殺抗議的羣衆，一九二五年又發生五月三十日的事件，學生、勞動者罷工。在南方的國民政府於一九二五（民國十四）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宣佈接受國父遺囑，不料八月二十日，廖仲愷在廣州遇刺殞命，國民政府設特別法庭，發現香港英政府圖顛覆國民政府之大陰謀（見中國國民黨八十年來大事記年表）廖仲愷與何香凝夫婦為國父和宋慶齡的好友，宋慶齡又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十一月廿三日，林森、張繼、居正在北京西山舉行西山會議，決定反共政策，十二月二日決議開除毛澤東等國民黨籍，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宋慶齡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一月廿日在廣州女校對婦女團體發表演講，三月廿日發生中山艦事件，先總統蔣公宣佈戒嚴，五月十五日提出黨務整理案，毛澤東退出，七月九日 蔣公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開始北伐，不料一九二七年黨內左右派分裂，武漢與南京的國民政府就反共與容共展開爭辯，六月一日決定解雇蘇俄顧問鮑羅廷，七月十五日汪精衛也與共黨分裂，八月五日發出取締共黨命令，一九二七年二月漢口成立婦女政治訓練班，開

校時，宋慶齡應邀演講呼籲婦女參加國民革命提高女權。自國父逝世後，宋慶齡雖為中國國民黨黨員，但傾向共黨，共黨及左派人士利用其特殊地位，干預國民黨的清黨工作，一九二七年八月宋慶齡與鄧演達等遠赴莫斯科二年，至一九二九年五月，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舉行國葬國父於南京中山陵，宋慶齡才由柏林回國，回國後堅持國民黨左派立場，五月二十六日國父遺體由碧雲寺南送，六月一日在南京舉行盛大的國葬儀式，一代偉人終於永眠南京紫金山的中山陵。宋慶齡回國後住上海中山故居，不久又回歐洲，到了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母親倪桂珍女士去世才又回到上海。

一九三一年八月鄧演達被捕，九月東北九一八事件發生，中日捲入十五年的戰爭。在這一時期宋慶齡在上海組織反法西斯組織，上海一二八事件後，設立國民黨傷兵醫院，奔走「政治犯」之釋放、公正裁判，要求「出版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這時莫利愛中山故居有魯迅、史米托列、史諾等左派人士來訪，一九三二年八月反戰反法西斯世界大會召開，遠東反對大會於一九三三年九月在宋慶齡住的中山故居召開，並與蔡元培奔走「政治犯」之釋放工作，十二月廿九日與蔡元培等成立中國人權保障同盟，一九三三年三月又組國民禦侮自救會，一九三四年五月三日組武裝自衛會，發表對日宣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三日全國救國聯合會沈鈞儒等被捕，日本外務大臣有田八郎接到上海總領事若杉的電報五三一號「十八日下午寺崎往市府訪秘書長俞鴻鈞，豐

田紡織事件為勞動爭議，背後有抗日救國會中共份子章乃器、沈鈞儒、李公僕等協助共黨及不穩份子實行暴動等」，中共又利用宋慶齡的特殊地位掩護親共的美國記者史諾進入陝北蘇維埃區。

八、抗戰期間奔走抗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發生西安事件，國軍剿匪工作暫時停頓，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宋慶齡與馮玉祥在國民黨三中全會發表實施「國父的三大政策，呼籲中國人民一致抗日，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件發生，一九三八年七月又在廬山組婦女指導委員會，這時鄧穎超已隨周恩來赴中共盤據地區，六月組織中國防衛同盟，並募款購買醫藥、糧食、衣物，但由於廖夢醒、廖承志是共產黨員，所得的物資都送到延安中共區，國際和平醫院、抗日大學、魯迅藝術學院都靠其維持，更發動華僑創立洛杉磯保育所發行中國防衛通信，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母親也參加了中國援助評議會，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就任中國防衛同盟議長及中國工業合作社社長，中國工業社是一九三八年七月由國民政府任命路易易勒為首席技術顧問，英大使克拉克協助開始為中國難民的生產業工廠，蔣夫人及孔夫人都參加，在中國西部西南部十六省設立了二千三百座工廠，七十支部擔任織布、紡織、編織、印刷、運輸、製粉、電扇、熔爐、玻璃、鐵、皮鞋、製糖、化學藥品等工廠工作。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二日宋慶齡與柳亞子等呈上蔣總裁書。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發生，下

午宋慶齡由香港飛往重慶，文書大半遺失，宋慶齡在重慶與姊妹和蔣主席相處融洽，政府也為宋慶齡開設事務所作為同盟辦公室。

九、成為中共利用工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抗戰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十二月宋慶齡回上海，中國防衛同盟改為中國福利基金會，一九四六年十月在上海設立三個托兒所，母子醫療診療所，援助衣物糧食，一九四六年又組織飢餓救濟特別委員會，公演國劇請梅蘭芳協助，後來又在湖南、廣東、福建成立製米合作社，也在甘肅設工業合作社、三十個學校孤兒院，又設立藝術作家基金。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宋家都隨政府遷台，但宋慶齡未逃出，初在上海設三個難民局救濟流浪的青年，但中共利用宋慶齡參加政治協商會，十月偽政府成立又選為副主席，又為中俄友好協會副主席，一九五〇年中國福利基金會改為中國福利會，發行半月刊「兒童時代」，又出席世界和平會議，一九五一年由蘇俄頒給所謂「史大林獎」，設立國際和平醫院，又任中國兒童保護委員會主席、婦女會名譽主席，十二月到維也納參加「世界人民和平會議」並擔任團長。一九五三年任中共偽憲法起草及選舉委員，一九五四年任人代會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中蘇友好協會會長。一九五六年訪問印度、緬甸、巴基斯坦等國及雲南省，又訪問印尼，一九六一年担任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紀念會主任委員，一九六四年訪問錫蘭，一九七五年由國家副主席改任人代會常務副委員長。從上述頭銜看

，宋慶齡在中國大陸淪陷後一直是担任無實權的工作，任憑中共擺佈。當一九七一年宋子文在美國去世，宋慶齡本有意赴美，但後來又因政治上理由不得自由，未能如願。

十、中共統戰陰謀失敗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四日傳出宋慶齡病危的消息，路透社十五日引用北平電台的廣播說年約九十的宋慶齡患了冠狀心臟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球症，新華社造謠說宋慶齡要求加入中共，台北的聯合報在第一版刊出，但專家分析這消息頗可疑，因為同一天的日本讀賣新聞報導宋慶齡高燒四十度二，在神志不清的情況，誤將呻吟為答應的可能性很大，十七日的中國時報刊出合衆國際社引用新華社的消息，中共恢復設置「國家主席」並封宋慶齡為「榮譽國家主席」，顯為中共修改憲法恢復「主席」鋪路，同一天的讀賣新聞也報導十六日的宋慶齡白血球六萬一千七百升至十五萬八千，十五日夜仍是四十度，中央社十七日台北電：此間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專家揭露，共匪在宋慶齡病重期間，不能表達自由意志之時，重施故技，對外大搞統戰陰謀。根據連日來發自北平的外電報導，宋慶齡五月十四日晚熱度高達攝氏四〇、二度，已奄奄一息，無法言語，匪黨則於十五日突然宣布她為「正式黨員」；十六日又在她的頭上硬套上偽政權「名譽主席」稱號。匪黨過去曾經常用將死或已死的人，從事對內、對外統戰。例如沈雁冰(茅盾)今年三月二十七日死亡後，匪黨就立即「決定」他為「黨

員」，並舉行所謂「盛大」的「追悼會」，其目的在安撫大陸知識分子日益增加的反共情緒。匪僞這次對宋慶齡的安排，是如出一轍的統戰手法，也必將為世人所不恥。

因宋慶齡是基督教牧師之女，也是信徒，她不可能在臨死前要求加入無神論的共產黨，而且是在發燒四十度二的情況下。

五日廿九日下午八時十分宋慶齡去世，六月四日安葬於上海「宋氏公墓」，中共利用統戰在海外未獲「認同」，利用宋慶齡最後「剩餘價值」宣傳更未成功。

十一、痛恨中共的遺書

本年七月一日日本產經新聞記者住田良能曾撰寫專文，析述「宋慶齡痛恨的遺書」全文如下：「孫文遺孀宋慶齡女士五月廿九日在北京結束了九十歲的生涯，死去前中共贈與憲法規定內所沒有的『中國名譽國家主席』，遺體以紅色的黨旗蓋上，宋女士是不是真的是『共產主義偉大的戰士』？最近一封文書傳到東京，原文以『宋慶齡致中共中央建議書』為題，另註明『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一日於上海』，因此這一封信是去年中共全國人代會前寫的，原文說『自人民共和國成立日起，我（宋慶齡自稱）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又担任人代會副委員長重責，但這三十一年間，我到底做了什麼？我感到有辱於做人民公僕的光榮稱號』這樣開始的書函，充滿了痛恨，她要求民主化，他對中共黨三中總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決定贊成思想解放，問題如何解決？能否徹底解決？提出質詢，並訴請除中共

之外民主諸黨派也能承認發行機關報刊。宋女士最後引用海外人士批評她的話作為結論；『我們（批評宋慶齡的海外人士）贊成孫文先生的理想，可是不能跟你（宋女士）走同一步調，你只有被共產黨當統一戰線利用的工具而已。做為國民黨左派四十餘年，理想到那裡？主義怎麼辦？國家，還有人民……』。這是不是真的『海外人士』的話呢？也許是，但也許是她自己深感痛恨而編造的。她生在中國最高級的資本家家庭，也是華麗的一族，也是『國民黨左派』，把孫文的理想藉中共所謂『人民』『革命』求其實現，但結果她是不是覺得被欺騙了呢？她把痛恨的心情向中共中央最高權力機構投訴，這封書函已成為她的遺書。」按：住田良能曾經來台協助古屋奎二完成「蔣總統秘錄」的撰著工作，嗣後曾多次前往中國大陸探訪南京中山陵及廣州黃花崗烈士墓，發現中山陵依舊有「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中山先生於此」的紀念碑，但黃花崗的青天白日黨徽已被紅衛兵塗掉。住田這篇專文是最近一封宋慶齡的遺書傳到東京，他看了之後證實宋慶齡晚年極為痛恨中國共產黨。

附記（一）關於宋慶齡的出生年月日治喪會發表為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出生，但此記載與她的兄弟姊妹之間的出生年月日有矛盾，有待考正。

（二）五月卅日日本產經新聞報導文革期中紅衛兵曾至上海孫中山先生故居大鬧一場，指宋慶齡過資本主義化的生活，產經新聞連載柴田穗「毛澤東的悲劇」亦指出大躍進中強迫宋慶齡在住宅內設土造爐。

（三）宋慶齡於一九一二年向衛斯理女子大學提出論文，題目為「二十世紀的最大事件」指出中國辛亥革命結束了四千年的君主統治，大膽地實施共和制度，愛好自由、平等、和平的中國人具有高度文化，為實現和平，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具有道德規範的國家，如有政治上對立的意見將由海牙的國際法庭解決。（見久保田博子譯「二十世紀的最大事件」）

（四）根據情報機關所得資料，去年七月，偽全國人代會前，宋慶齡等一批附共人士曾向中共要求准許民主黨派發行機關報，對中共加以批評並要求民主化。中共置之不理。

代售中華民國第十八屆

國際影展特刊 彩色精印

每冊台幣150元國外另加郵費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